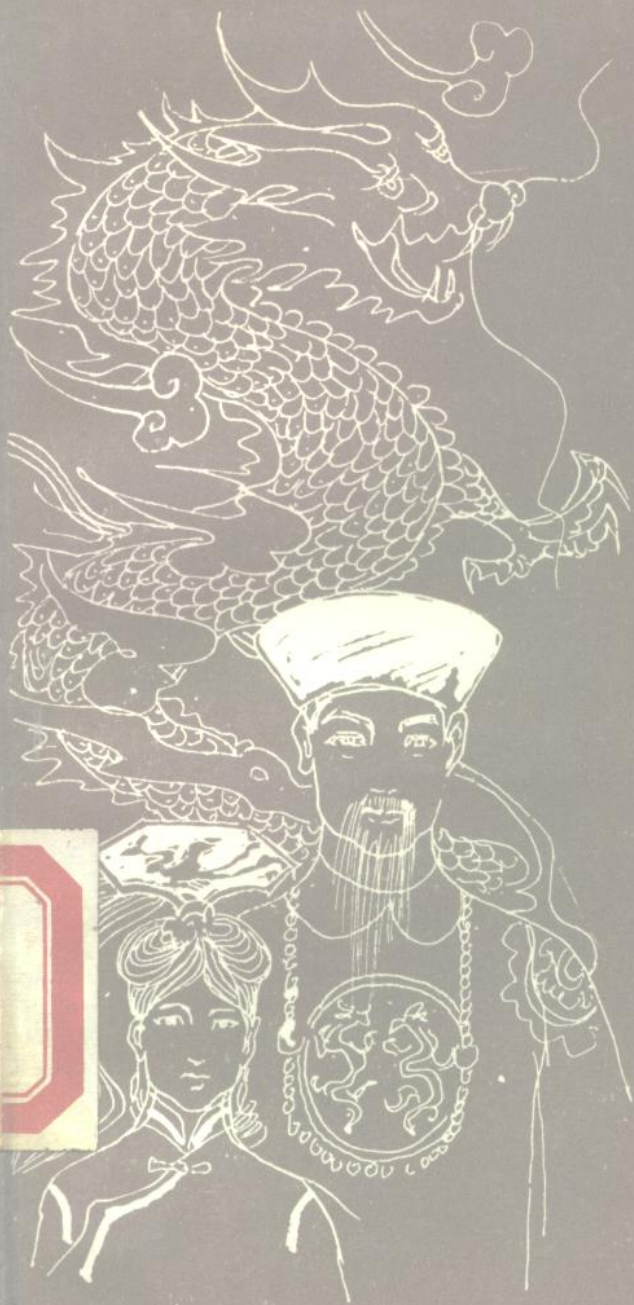


清代帝王后妃传
(下)

满学研究会 编



清代帝王后妃传
(下)



侨出版公司

清代帝王后妃传

满学研究会编

下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满学研究会编委会》

顾问：溥杰 戴逸 金默五
主编：连昌裔
编选主委：秦宝琦
副主编：魏鉴勋 刘景宪 陈 絳 孙祥澍
编委：吴永兴 吴玉清 赵阿平 李海晖 毓 峨
李起陵 丁 红
封面设计：连昌裔 契 仁

清代帝王后妃传(上、下)

满学研究会 编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4号
(邮政编码：100007)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32开
字 数 420千字 19.125印张
版 次 198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74-197-4/K·03

上、下册 定 价 平 装10.35元
白 板 纸11.35元



西太后
(慈禧)
像



咸丰帝像



光緒帝像



傳儀帝像

目 录

前 言	满学研究会
道光帝述评	张玉芬(1)
咸丰、慈禧与恭王	庄 练(14)
慈禧奕訢斗法记	戴 逸(85)
那拉氏	王道成(90)
同治与光绪	庄 练(107)
同治帝之死	徐艺圃(166)
光绪早期思想初探	孔祥吉(178)
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湉之死	朱金甫 周文来(202)
珍妃 附: 瑾妃	王道成(222)
1924年溥仪出宫前后琐记	溥 佳(225)

道光皇帝述评

张玉芬

有清一代，康乾之世是为盛世，对盛世之君康熙、乾隆的研究，较为深入。嘉道之世是为衰世，对衰世之君嘉庆、道光的研究尚未深入展开。盛世的经验固然值得总结，衰世的教训也应该记取。尤其是道光一朝，处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时期，值得探讨研究的东西更多。本文意在另一方面作一探索。

清王朝在经历了康乾盛世至嘉庆时，整个社会已呈现出“四海变秋色”的衰世之象。封建制度已然病入膏肓。而西方资本主义正迅速发展，不断东侵，在中国沿海扣关破门。这是清帝国自立国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大变局。就在这世界潮流剧变的时代，道光登上了皇位。

道光帝在位凡三十年，为挽救清王朝的衰败，历尽沧桑。试论举大事数端，以记道光朝之得失，亦见道光帝之瑕瑜。

一 对漕运、盐政的改革

清代中叶以后，社会经济中积弊丛集，其中尤以漕运和盐政问题最为严重。清代漕粮有正兑、改兑、改征、折征诸名目。清政府每年从两江、湖广等省征收的正兑漕粮数百万石，悉经大运河运至通州、北京，供给京师。漕政“病官病民”。办漕官员贪污中饱，包漕衿棍，巧取横索。南粮北运，专恃运河，也常因

运河河道的浅阻发生运输困难。为从根本上解决漕粮北运问题，道光不顾廷臣和办漕官员的反对，决定试行海运。他认为海运中风涛之险，盗贼之事，只要“严饬船、水人等小心管驾，伊等熟悉水性，定能履险如夷”^①。但是，有关官员不愿承担海运风险，均以为海运窒碍难行。道光五年（1825年）六月，他任命勇于改革、政绩卓著的安徽布政使陶澍为江苏巡抚，筹措海运事宜。陶澍两次亲赴上海，确定了具体的海运方案，获道光允准。道光六年二月初一日，第一批海运船只，装载漕米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余石扬帆出海。海船“自吴淞口出十溇，东向大洋至佘山，北向铁槎山，历成山，西转之罘岛稍北抵天津”^②。总计水程四千余里。道光派遣朝廷重臣赴津验米。米色莹洁，且时间缩短，运费低廉。至六月初江南漕米全部运完。道光实行海运漕粮，不失为明智之举。后来由于各种势力的反对，道光没有能坚持实行。

清代盐法大率因明制，各省行盐循用纲法，使盐业之利尽归盐商。各盐商层层盘剥，兼之各省官绅皆视盐务为利藪，巧取豪夺。致使私盐充斥，官引滞销，国与民交受其困。道光时，盐业困顿凋蔽愈益严重。道光十年（1830年），两江总督陶澍以淮盐疲蔽已极，屡陈积弊情形。道光遂对盐政实行改革。原两淮盐政无管辖地方之责，文武员弁均无所属，因而疏销巡缉难期令行禁止。道光将两淮盐政裁撤，两淮盐务归两江总督管理。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推广实行票盐制。于场区适中地点，设局收税，无论什么人，只要照章缴纳税课，即可领票运盐，在限定的地域范围内，在规定的期限内自行贩卖。票盐制革除了专商专岸之弊，改变了过去盐商垄断盐利的局面，国家则可收化私为官之益。票盐制广为推行后，私盐不禁自绝，官盐畅销无阻，盐课成为国家财政一大收入。票盐法行之有效，时论皆以为救弊良策。

①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三。

② 《陶澍》，《清代七百名名传》（上）。

后来由于各种势力的反对，盐政的改革半途而废。

二 对部分矿藏的开禁

清代自乾隆中叶以后，常以“开矿聚集亡命，为地方隐忧”为由，对矿藏的开采实行封禁政策。道光即位之初，仍企图实行这种政策。后来，道光逐渐认识到“开矿之举，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下，仍是藏富于民”^①的道理。道光朝后期解除了对矿藏开采的封禁，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鼓励矿藏的开采。他对借口办矿“累民扰民”、“人众易聚难散”、反对开放矿禁的官员进行劝导，告诫他们不要“因噎废食”。道光又根据过去官办矿政，“官吏因缘为奸，久之而国与民俱受其累”的弊端，提出“官为经理，不如任民自为开采。”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令有关官员“体察地方情形，相度山场，民间情愿开采者，准照见开各厂一律办理，断不可假手吏胥，致有侵蚀滋扰诸弊，”^②由此看来，道光对开矿一事提倡颇力，措施亦得当，这对道光一朝的矿政建设大有裨益。

三 对奢靡风尚的矫正

清代自乾隆时始，奢靡之风，代代相承，愈演愈烈。奢靡之风使统治者对人民的巧取豪夺有增无已。为了挽救清朝统治危机，道光力图遏止奢靡之风，使整个社会能黜华崇实。

道光于即位之初，即颁发声色货利论。力陈声色“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③的严重危害。道光二年（1822

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三。

②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三。

③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三。

年），他规定在皇子皇孙指婚其福晋后，父家置备妆奁“不得以奢华相尚，一概务从俭约”，“如有靡丽浮费之物，经朕看出，不惟将原物发还，并加以议处”^①。

当时，社会奢靡之风无过于河工者。清朝漕运依赖运河，历朝对河政十分重视，国家财政拨款亦十分丰厚。然而河工和漕政一样，弊窦丛生。国家每年靡帑数百万，真正用于工程之费不及十分之一。其余仅供河吏挥霍而已。此外，过往官员、举贡生员皆欲染指分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下达上谕，严行禁止过往官员及举贡生监幕友人等分肥饱己私囊的卑污行迹。他说：“河工银两，丝毫皆关国帑，河员承领钱粮，均有购料修防之责。倘过往官员、举贡生员、幕友等视为利途，纷纷前往，该员等焉有自己出资之理？无非滥请支领，克减工程以为应酬之费，于河务甚有关系，不可不严行禁止。”^②道光的一纸上谕能不能力挽颓风，自当刳论，但道光力挽奢靡之风的态度是坚决的。

四 对吏治的整顿

清朝中叶以后吏治的腐败更甚于前代，究其原因，不能不和清代广为推行的捐纳制度有关。捐纳的恣意推行，使得仕途混乱，贿赂公行，官吏贪鄙成风，产生了大批腐败、昏聩的官吏和骇人听闻的贪污现象。道光二年（1822年），他果断地下达了“嗣后现任官员不准加捐职衔，著为例”^③的谕令。这表明道光起初是有意于部分地终止捐纳弊政的。然而，后来由于国家财政的匮乏，受传统经济思想束缚的道光，不得不仍旧求助于

①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二。

②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一一。

③ 《清宣宗实录》卷三八。

捐纳制度。但道光对通过捐纳取得官职之人，内心深为厌恶，对其戒备尤深。他曾多次向一个外放官员披露心曲：“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我最不放心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①

清代京官和地方府厅州县各级官员俸给微薄。然而各有生财之道。京官依赖外官之馈赠，外官则依赖种种陋规，科敛民财。道光企图对各地陋规加以整顿。道光元年，他令直省督抚率藩司，“将所属陋规逐一清查，应存者存，应革者革”^②。从这道上谕看来，道光整顿陋规的决心是有的。但是，此谕下达不久，即“朝有诤臣”，“连章入告”。道光只好明降谕旨，停止清查直省陋规。

道光还对那些年老、诸疾缠身而又恋栈不肯退位者加以罢斥。云贵总督伯麟，年逾七旬，素患腿疾。道光将其调离总督任所，授以协办大学士衔，供职京师。回京不久，伯麟即要求外放。道光严厉申斥伯麟说：“知总督之养尊处优，而不知任大责重。以伊衰暮之年，使加以简任，尚安望其称职？”^③随即毅然将其休致。

五 对鸦片流毒的禁止

清代中叶以后，鸦片烟毒的泛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趸船揽储于外洋，快蟹、扒龙等艇飞棹走私，吸食者遍布城乡各地。道光即位后深感问题的严重，于道光元年，即严申鸦片禁令。道光二年，严令各海口严拿烟贩。道光三年，对地方官查拿鸦片不力者，订立议处失察条例，严厉禁止

^① 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②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一。

^③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二。

私种罂粟。道光十一年（1831年），命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务将鸦片烟“来源杜绝，以尽根株，勿令流入内地，以除后患”^①。道光的这些措施并未能遏止鸦片流毒的泛滥。一八三八年六月，鸿胪寺卿黄爵滋提出以死刑来惩治鸦片吸食者、对吸食鸦片的大小文武官员照常人加等治罪的严禁主张。道光得到这个事关重大的奏摺，立即命令各省督抚就此各抒所见。从一八三八年六月至一八三九年六月的一年中，各省督抚纷纷遵命发表意见，其中绝大多数对黄爵滋的主张持反对态度。一八三八年九月，湖广总督林则徐在著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向道光痛陈严禁鸦片的迫切性。他说：“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钜，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在黄爵滋重治吸食的主张提出后，由于大多数督抚的反对而处于游移中。林则徐的奏摺，大大坚定了道光的决心。他在读到“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后，大为震动，“朱圈赞赏”^②。道光终于挣脱了弛禁派的羁绊，立场鲜明地站到了严禁派一边。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他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令他“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③。林则徐在广州的一切禁烟措施都得到道光的首肯和支持。道光对于林则徐向外商宣示的“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的决心尤为赞赏，称誉林则徐“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林则徐不负道光重托，采取有力措施，终于迫使外国鸦片烟商交出鸦片二百多万斤。道光对此十分满意，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交部从优议叙。并令林则徐于收缴完竣

①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六。

②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一一。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

后，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共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慑”^①。林则徐遵照道光命令，将缴获鸦片于广州虎门太平镇当众销毁。道光接到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奏报，揽奏兴奋之极，提笔批曰“大快人心一事！”道光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厉行禁烟，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因而是一种进步的有积极意义的举动。英国人卫三畏对道光的禁烟、销烟给予了这样的评价：“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了，……在世界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②这种评价并非过分。

六 鸦片战争中对侵略者的抵抗和妥协

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道光作为这场战争的组织者、领导者，自然难辞自责。但是，如果作出道光的妥协路线导致战争失败的结论，似乎尚欠公允，因为在鸦片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道光坚持的是抵抗路线。

一八三九年初，道光派遣林则徐赴广东禁烟时，亦筹划着沿海的防卫。道光告诫两广总督邓廷桢说，虎门海口为粤海中路咽喉，应妥为布置。一八三九年九月四日，英国舰艇向中国水师船只开火，遭到中国水师的有力回击，迫使侵略者狼狈而逃。道光大受鼓舞，在林则徐的奏报上批示说：“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猛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③一八四〇年七月，英军攻陷定海。这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投降派纷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

③ 转引自弁安世著：《鸦片战争》。

纷在道光面前飞短流长。这些流言动摇了道光对林则徐、邓廷桢的信任和支持。当英舰沿海北上时，道光命直隶总督琦善在英舰驶至天津海口时，不必立即开枪开炮。不久，英舰到达天津大沽，投书清廷，提出割地、赔款的无理要求。道光虽然拒绝了这些要求，但慑于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没有公开号召抵抗的胆量，反而承认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措置失当，并作了代伸冤抑，重治林则徐之罪的许诺。那么，是不是从此以后道光就走上了向侵略者妥协投降的道路了呢？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英舰云集大沽时，道光虽然不敢公开号召抵抗，但在内部仍进行着抵抗的部署。他曾命令盛京将军耆英对潜入奉天洋面游弋的英军舰只“即开放枪炮尽力歼除”^①。琦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派赴广东，道光赋予他的并不是向侵略者妥协投降的使命，而是谕令琦善“一面与之论说，一面妥为预备，如桀骜难驯，毋得示弱，需用兵丁，著一面飞调，一面奏闻”^②。一八四一年一月，英军攻陷大角、沙角两炮台，重新挑起了新的武装冲突。道光于一月二十七日下达宣战令。在宣战令下达后，道光接到琦善“敌船坚炮利，无可扼守，只得回避重罪，从权办理，吁恳施恩”的奏报后，十分气愤，责令琦善“赶紧团练兵勇，奖励士卒，并储备军需粮饷枪炮火药。”道光在另一份上谕中，愤怒驳斥琦善所谓：“地势之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示羁縻”的投降谬论，表示“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③。与此同时，道光授奕山为靖逆将军，征调四川、湖北、贵州三省兵丁前往广东。将力主投降的琦善革职拿问。道光的军事部署，由于前线将领的懦弱无能，没有收到实际成效，《广州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四。

③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十。

和约》的签订是不能完全归咎于道光的。在英军重又挑起更大规模的战争，相继攻占浙东三镇时，为了阻止英军长驱直入的进攻，道光作了鸦片战争中最后的军事抵抗的部署。道光在鸦片战争中的抵抗一直延续到英军破吴淞沿长江进犯时。这中间虽有动摇，但抵抗是道光指导思想的主流。

鸦片战争中，道光既然主张抵抗，也实行过抵抗，何以不能领导这场战争取得胜利呢！单就道光本身而言，是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战争的结局。

知己知彼，这是任何一个战争指导者取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而鸦片战争中的道光皇帝却在既不知己更不知彼的状态中指导了这场战争。当鸦片战争发生时，道光对于当时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惊人的贪污、腐败、军备废弛的状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在战争开始时，道光成为一个速胜论者，幻想依赖天朝声威，一举慑服侵略者，轻而易举地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样，道光在战争中始终就没有确立起一个总体的战略方针和具体部署，完全被动地实行一种议战复议和，议和复议战的摇摆战略。同时，道光对侵略者的了解更加浅薄。当历史把一个崭新的西方世界推到了他的面前，而了解这个世界又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道光理应象同时代的林则徐所做的那样，了解新事物，学习新知识，做到知己知彼。然而道光却采取了深闭固拒的态度。一个对敌情完全处于蒙困状态的指挥员，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当它面临强敌进攻时，唯一的取胜之道，是依靠人民，发动、组织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由封建政权的性质所决定，道光不仅不敢号召、动员人民起来进行反侵略战争，反而对人民的自发斗争实行镇压。道光在面临外敌入侵时，他所想的无非是寄希望于那些世受国恩，定能舍身图报的皇亲国戚、文臣武将；无非是相信“非赏功不足以激士气而励军心”。

当这一切都不能奏效时，陷于绝望中的道光只得听任投降派在出卖民族权益的条约上签字画押。

在鸦片战争的关键时刻罢黜抵抗派，起用投降派，道光在战争指导上的错误莫此为甚！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厉行禁烟，并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广州方面的反侵略战争。但自英军攻陷定海后，道光企图以惩办林则徐来换取对侵略者的妥协，将林则徐革职、充军，将抵抗派完全排斥于战争之外。与此同时，一批投降派官员被陆续赋予重要使命。琦善、伊里布、耆英的被重任，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场战争的结局。

七 对张格尔叛乱的平定

张格尔系乾隆时因叛乱被诛的大和卓木波罗泥都之孙。他起初匿居于浩罕，后在喀布尔受英国豢养。张格尔在英国的援助之下组织和装备了军队，长期以来即在南疆活动。道光六年（1826年）七月，张格尔率众五百余，由开齐山路突至回城，拜其先祖和卓木之墓。官军以兵剿之，张格尔突围而出，叛乱迅速蔓延。这年八月，张格尔叛乱势力连续攻陷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张格尔叛乱，使回部城镇沦于战火，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摧残，也危及了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道光决定遣军入疆平叛。他任命大学士、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大臣。同时征调吉林、黑龙江、甘肃、四川及健锐、火器营军队出关。在整个平叛战争中，道光先后调遣兵力总数达到三万六千多人。道光经周密地调度筹划，保证了粮饷及军事物资的源源供应，做到了“馈饷于万里而遥，告成于一年之后，兵食无虞短绌，帑项不敢虚靡”^①。道光要求前

^① 《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卷二九。

敌主帅必须赏罚公当，号令严明，要求军队“队伍整肃，秋毫无犯”。道光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他认为新疆久隶版图，回户安居乐业者垂六十余年，此次叛乱“自系逆裔张格尔煽惑所致，其中甘心助逆者，谅必无多”^①。他依据这种正确分析制定了恩威并用，效顺者许以自新，负隅不悛者尽行剿灭的区别对待政策。

道光七年（1827年）十二月，张格尔被清军俘获。清政府平叛战争的胜利，除了由于张格尔“须索科派，人心离散”的客观原因之外，道光所实行的较为正确的政策，是其主要原因。道光平定张格尔叛乱，根本宗旨在于维护清王朝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统治。在平叛战争中，道光多次下达“殄灭丑类，俾无遗种”^②的残酷命令，因而，在这场战争中，维族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但是，道光对张格尔叛乱的平定，无论是对防止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还是对巩固中国西部边疆，维护祖国的完整、统一，在客观上都有积极意义。

八 对湖南、广东、广西瑶族人民起义的镇压

道光十一年十一月，湖南永州江华县锦田乡瑶民联合广东瑶民，在赵金龙领导下发动起义，并攻克两河口地区。瑶族人民起义的迅速发展，使道光十分惊恐。他急忙调遣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赴剿，并令两广总督李鸿宾、广西提督各防边界。李鸿宾遣提督海凌阿率军进剿。起义军早有准备，他们装扮成清军模样，混入军中。大批起义军则设伏山沟陡狭之“池塘墟”。海凌阿率军至，起义军“乘高下突”，清军立即陷于混乱，海凌阿被当场击毙。起义军声威大振。道光慌忙增调贵州提督余步云至湖南，又针对起义军流动作战的特点，布置各地实行“坚壁清野”。

^{①②} 《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卷、一五。